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

清修法师

主编

闽台佛教论

何绵山 著

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
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闽台佛教论

何绵山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闽台佛教论/何绵山著. --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80254-321-8

I. ①闽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佛教史-福建省-文集②佛教史-台湾省-文集 IV. ①B94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205728 号

闽台佛教论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、清修法师主编)

何绵山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卫 菲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50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321-8

定 价: 32.00 元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

门；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；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烦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，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

客观性、纯学术性，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，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，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，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，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，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，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，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，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，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，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，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，相对来说，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，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，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，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，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，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，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

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

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藉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藉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



有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目 录

总 序	朗 宇(1)	
福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	(1)	
福建佛教的特点	(23)	
弘一大师与近代闽南佛教	(53)	
太虚法师与福建佛教	(83)	
虚云法师与福州鼓山涌泉寺	(91)	
圆瑛法师与闽台佛教	(102)	
福建寺院建筑艺术	(125)	
日据时期福州鼓山涌泉寺与台湾五大法派	(135)	
台湾“人间佛教”初探	(166)	
试论当代台湾佛教界对青少年教育的介入与 影响	(206)	◎
当代台湾佛教界对资金的吸纳	(243)	目
试论台湾解严后佛教的多元化	(286)	录

台湾寺院的建筑艺术	(313)
何绵山发表探讨与闽台佛教有关的文章目录 ...	(330)
后 记	(341)
《宝庆讲寺丛书》已出书目	(344)

福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

一

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一带,但在西晋之际,佛教就传入闽地。西晋太康三年(282),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(即今福州市)建造绍因寺(后改乾元),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。寺名绍因,有“继承”意义,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。西晋太康九年(288),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,为福建省第二座佛寺。南北朝时期,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宋昇明至南齐永明,在20多年时间中,福建就建有五寺,即侯官明空寺、妙果寺、长溪(今霞浦)建善寺、延福寺、松溪资福寺等,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、闽东传播。梁武帝时“全省共建佛寺二十八所”^①,并开始建塔,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,闽县(今属福州)的法林尼寺,建于梁大通元年(527),正如《三山志·寺观》记载:“闽中尼寺自此始。”陈朝时福建建寺30座。陈永定二年(558),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。同年,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,

◎ 福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

^① 魏应麒:《五代闽高僧与神话考》。

挂锡延福寺三年，翻译佛经，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。

隋代福建共建寺 12 座，佛教继续在闽东、闽北、闽南传播。隋初，陈后主之子镜台到永春避难。隋开皇九年（589），莆田金仙院升寺，由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无际禅师任寺主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修持《法华经》，大弘天台祖业，剃度僧徒百人，授三皈弟子万众，是传天台宗的一代名僧。

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，全省新增寺院 735 所，但发展不平衡。主要在闽中、闽东、闽北，闽南也趋于兴盛。唐代佛教传入福建有多种渠道，如仅三明地区就有：远方僧人到此隐居修行而进行传播、从江西各寺庙传入、由广东经汀洲传入、由闽中传入等，因此既有整体性，又有独立性。唐代福建高僧辈出，一些高僧如怀海、希运、灵祐、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唐代福建名刹林立，一些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，大都是建于这一时期，如建于唐建中四年（783）的福州鼓山涌泉寺、建于唐咸通八年（867）的福州怡山西禅寺、建于唐乾宁元年（894）的福州金鸡山地藏寺、建于唐咸通十一年（870）的闽侯雪峰崇圣寺、建于唐中和元年（881）的莆田囊山慈寿寺、建于唐长庆二年（822）的泉州开元寺、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。《三山志》卷 33《寺观》称当时造寺“殫穷土木，宪写宫省，极天下之侈矣。”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，富丽堂皇。

五代时期，福建“佛法独盛于其时”^①。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。闽王王审知“雅重佛法”^②，全力扶持佛

① 《鼓山志》卷 7《艺文·碑序》。

② 《十国春秋》卷 91《闽一·世家》。

教。光化三年(900),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,度僧 2000 人。天复二年(902),他在福州开元寺建戒坛,度僧 3000 人。天祐三年(906),他在福州开元寺铸丈六高铜佛像一座、丈三尺高菩萨像两座;越年,又设 20 万人斋于开元寺,号曰“无遮”。同光元年(923),为庆祝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,王审知建太平寺,铸释迦弥勒像,又作金银字四藏经。王审知还特地命令浮海运木到泉州建造仁寿塔(西塔)。闽国王氏家族对佛教也极为热衷,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(928)在福州开元寺开坛,度僧两万人。后晋天福元年(937),高祖石敬瑭在福州再次度僧一万一千人;940 年 7 月,王曦度僧万人,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受度。其侄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 16 年中,优礼僧人,大造佛寺,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王氏据闽时共新增寺院 706 座,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,也由僧人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。其正如志书所记:“闽佛刹千有余区,本其兴废,皆王氏织其协力奉教。”^①南宋人黄干在《勉斋集》卷 37 中记道:“王氏入闽,崇奉释氏尤甚,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。”当时福建僧人猛增,据《三山志》载,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六万多人,福州鼓山涌泉寺、怡山长庆寺、闽侯雪峰崇圣寺的僧人均多达一两千。当时高僧云集,僧人地位空前提高,如雪峰义存常被迎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说法,官府斋僧建寺都咨请他决定。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,如福州鼓山涌泉寺,王审知“所施膳僧之田多至八万四千亩”^②。统治者还以

① 《鼓山志》卷 7《艺文·碑序》。

② 《鼓山志》卷 5《田赋》。

法定的方式,使寺院占有肥沃土地。当时一些贵族和富豪也多舍田入寺,正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 21《田赋》所载:“是时膏腴田尽入寺观,民间及得其饶窄者,如王延彬、陈洪进诸多舍田入寺。顾窃檀施之名,多推产米于寺,而以轻产遗子孙,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。”莆田、仙游两县许多大姓争施财产,造佛舍为香火院,多至 500 余区。

宋代福建佛教愈加兴旺,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。宋淳熙《三山志》卷 40 称福州“金银福地三千界,风月人居十万家”。《八闽通志》卷 75《寺观》称:福建寺院“至于宋极矣!名胜地多为所占,绀宇琳宫,罗布郡邑”。仅福州府,庆历中(1041-1048)有寺 1625 座;绍兴中(1131-1162)有寺 1523 座。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,也建得富丽堂皇,“祠庐塔庙,雕绘藻饰,真侯王居”^①。宋吴潜叹云:“寺观所在不同,湖南不如江西,江西不如两浙,两浙不如闽中。”^②仅泉州,宋初“寺院之存者凡千百数”^③。连闽北建州,寺院也近 1000 座。这是因为许多“富民翁姬,倾施资产以立院宇者亡限”^④。寺院经济发达,占据许多良田,正如时人韩元吉在《南涧甲乙稿》卷 15《建宁开元禅戒坛记》所云:“闽之八州,以一水分上下,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。”许多达官文人都喜在寺院中设立自己的读书处,以便攻读之余和高僧谈古论今,吟诵作诗,如南宋名相李纲在绍兴元年(1131)曾为邵武同乡宋禅师在

① 《三山志》卷 33《寺观》。

② 吴潜:《许国公奏议》卷 2《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》。

③ 《泉州府志》卷 16《坛庙寺观》。

④ 《三山志》卷 33《寺观》。

泰宁建寺庙而作《瑞光丹霞禅院记》。一些名人也以游寺为乐事，朱熹曾多次游寺，并多处题写对联，如为漳州开元寺题“鸟识玄机，衔得春来花上弄；鱼穿地脉，挹将月向水边吞”。为南安雪峰寺题写：“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上过；门庭开豁，江山常在掌中看”。

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，亦为全国之首。仅福州，“农家之子去而从释氏者常半夫焉”^①。北宋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，“斋僧尼等至一万余人，探闾分施衣、巾、扇、药之属”^②。至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止，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49次。宋谢泌在《长乐集总序》写道：“潮田种稻重收谷，山路逢人半是僧，城里三山千簇寺，夜间七塔万枝灯。”连闽清小县，宋代最盛时亦有僧尼260人，宋理宗还为闽清白云寺御书“白云山”三字，以竖碑寺前。僧尼在闽南一带也发展速迅，“至道元年（995）六月……是岁太宗阅泉州僧籍已度数万籍，未度者犹四千余”^③。使皇帝为之惊骇。据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，仅泉州市区，就有“僧侣六千”，以至朱熹为泉州开元寺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。宋代福建僧人被朝廷赐号的为数不少，如赐号“真觉禅师”的省澄、赐号“慧日禅师”的文矩、赐号“法慧大师”的行通、赐号“悟空大师”的清豁、赐号“法济大师”的道岑、赐号“文慧大师”的法周、赐号“真觉道者”的志添、赐号“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”的普足、赐号“昭

① 卫泾：《后乐集》卷19《福州劝农文》。

② 《三山志》卷40《土俗》。

③ 《宋会要辑稿》第200册《道释》。

觉大师”的子琦、赐号“灵应大师”的道询等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宋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全国“僧 397615 人，尼 61239 人，”福建僧尼为“71080 人”。以至时人黄干指出：“髡其首而游于他州者，闽居十九焉。”^①

元朝，统治者热衷于念经、祈祷、印经、斋僧等各类佛事活动，并大建塔寺以修功德。所以福建元初虽经战乱而毁废了不少寺院，但在短期内又开始发展。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元世祖忽必烈命僧澄鉴重兴毁于战乱的宁德支提寺，历时十五载告竣。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），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率军远征爪哇，从后渚港放洋，因无功而还，受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。亦黑迷失由此特发诚心，谨施净财，广宣佛典。延祐二年（1315），释觉琳在建阳县后山报恩寺万寿堂雕印《毗卢大藏经》，亦黑迷失全力支持并亲任劝缘主。翌年，他刻立《一百大寺看经记》碑，指定全国 100 座大寺，“各施中统钞一百锭，年收息钞，轮月看转‘三乘圣教’一藏”^②，并将租田两千石，散施泉州、兴化各处寺院，以作看转藏经之资。亦黑迷失指定的 100 座寺中，福建占了 32 座，其中泉州有 17 座，故《金氏族谱》附录《丽史》称泉州为“僧半城”。泉州开元寺在元代有上千僧人，昌盛一时，正如《泉州开元寺志》称：“历五代而至宋，旁创支院 120 区，支离而不相属。至元乙酉（1285），僧录刘鉴义白于福建省平章伯颜，奏请合支院为一寺，赐额‘大开元万寿禅寺’。明年延僧玄恩主持，为第一世，禅风远播，衲子竞集。复得契祖继之，垂四十年，食常万指。”元代福建

① 《福州府志》卷 14《风俗》。

② 《福建通志》第 45 册。